

中 国 古 代 十 大 诗 人 精 品 全 集

杜
牧

精
品
全
集

精品全集

中国古代十大诗人精品全集

杜
牧

● 齐元涛

张斌荣

王

宏

选注

大连出版社

1997 · 大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十大诗人精品全集/邓绍基、周秀才、侯光复主编, - 大连:大连出版社,1997.1

ISBN 7-80612-338-5

I. ①中… II. ①邓… ②周… III. 古体诗-作品集-中国-古代 IV. 1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8126 号

中国古代十大诗人精品全集(全 9 册)

邓绍基 周秀才 侯光复 主编

大连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2 号) 三河市科教印刷厂印刷

字数:2700 千字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25 插页 36

印数:0 001~8 000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许文彦

责任校对:刘 青 宋 丽

装帧设计:北京羽人创

巩明德 程 萍

意设计中心

刘 珍

ISBN7-80612-338-5/I·55

登记号:(辽)第 15 号

定价:160.00 元(全 9 册)

杜牧
丙子秋
孟軻筆



杜牧 像

《中国古代十大诗人精品全集》

主 编 邓绍基 周秀才 侯光复
常务副主编 康 琳
责任编辑 许文彦
装帧设计 北京羽人创意设计中心
插图绘画 王国能

《屈原陶渊明》卷	韩传达	选注
《王维》卷	黄 涛	选注
《李白》卷	管士光	选注
《杜甫》卷	严燕子	选注
《白居易》卷	谢思炜	选注
《李商隐》卷	卢永璘	选注
	管士光	
	齐元涛	
《杜牧》卷	王 宏	选注
	张斌荣	
《苏轼》卷	陶文鹏	选注
《陆游》卷	冷成金	选注

前 言

中国是诗的国度。自古以来,诗歌创作繁荣,蔚为大观,诗仙诗圣,代不乏人。其中,屈原、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杜牧、苏轼和陆游,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具有地位和影响的十位大诗人。他们的诗名与日月同辉。无论是阅读、欣赏还是收藏,其诗作中的精品都是当之无愧的艺术绝品,堪称“国宝”。

《中国古代十大诗人精品全集》10卷9册,选编了这十位诗人的全部经典之作。若以单卷论,它收入了每位诗人一生中最重要作品,其中许多卷都是迄今收诗最多的选本。若从整体看,本书在时间上跨跃了中国古典诗歌创作最辉煌的历史时期,几乎囊括了代表这些时期诗歌艺术最高成就的佳作名篇(本书所收入的古典诗歌作品只包括狭义或严格意义上的“诗”,不含“词”和“曲”)。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一般文学爱好者,而非文学研究专家。因此,其选注体例多从有助于阅读与欣赏着眼,不特别强调学术性。在选注过程中,尽量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一不标新立异,二不作繁复的辨析,只取多数学人认可

之说。

本书每卷均含“作者小传”、正文和附录三部分。“作者小传”扼要介绍诗人的生平活动和创作特色,使读者对作者的一生有个总体了解。正文中,每首诗后一般都有“题解”和“注释”。前者主要介绍作品的写作背景和抒情主题。后者意在扫除阅读中的语言障碍。如果读完本书后,读者还想对诗人作更全面的了解,附录中的诗人“生平创作简表”和“诗作版本简目”可以起到引路作用——读者据此可以找到诗人的其他选本或诗文集,进一步研读。

本书入选的诗作均按作者创作的时间顺序排列。除屈原外,每个诗人的作品还按作者生平活动的阶段性或作品思想艺术的变化加以分期。这在其他选本中是不多见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爱好古典诗歌的一般读者更好地把握每一首诗作特定的思想内容。当然,诗人的艺术创作是自然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不能截然分开。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人的任何一种理论上的分期都会有其不完善的地方。这些地方,今后有待于学术界从其他角度再加以完善或弥补。

本书在选编、出版过程中得了学术界、出版界许多专家的指导与帮助。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韦凤娟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管士光先生、北京师范大学的谢思炜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的袁济喜先生和北京出版社的李志强先生,没有诸位的热情相助,本书是不会这么顺利出版的。在此我们深表谢意。

杜牧的生平与创作

诗至唐而众体悉备，诗人辈出且佳作如林，呈现出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辉煌气象。但到杜牧生活的晚唐，诗运也如国运一样，正日趋衰落。所以，杜牧此时的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尤其是他的律诗和绝句，为绮靡纤弱，神疲力薄的晚唐诗坛增添了生气，也为由于盛唐和中唐作家多方开拓而难乎为继的局面开辟了新的境域，使唐代的诗歌形成初、中、盛、晚四个互相争辉的历史阶段。因此在唐代诗坛上被称为“小杜”。

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卒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享年五十岁。他一生主要经历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朝。杜家世代为官，追溯得远点，可到杜牧的十六代祖晋代名将杜预。在杜氏家族中，杜

牧最推崇祖父杜佑。杜佑所撰《通典》二百卷，是我国第一部最有影响的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政书。杜佑生三子：师损、式方、从郁。从郁就是杜牧的父亲，他一生抑郁不得志，虚弱多病而早卒。父亲死时杜牧只有十四、五岁，他和弟弟、母亲，靠祖上留下的一点产业维持生计，家境日趋困顿。但世代学儒的家庭激发杜牧从小就立志继承前辈学业，广泛涉猎诸子百家，增长了知识，开阔了思路。青少年时代的杜牧就表现出了迫切的用世之心。

那时，曾经是历史上空前强大和繁盛的唐王朝，有如黄昏日照、正步入苍茫薄暮。虽然唐宪宗后期出现了短暂的“元和中兴”，但小康局面转瞬即逝，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广大农民与封建地主这一对社会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均田制废弛后，土地兼并严重，官僚地主封建商人和僧侣占有了大量土地。社会上出现了极端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同时，朝廷穷兵黩武，加上统治集团享乐求仙，豪奢浪费，国库为之一空。于是，只能巧立名目，设立各种苛捐杂税。广大人民走投无路，终于爆发了黄巢起义。虽最后被镇压下去，但唐王朝也因之土崩瓦解。同时，唐朝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藩镇割据，拥兵对抗中央；朝廷内宦官专权，任意废立皇帝；党争激烈，以李德裕、牛僧孺为首的两个集团的纷争，延续了四十年。除此之外，边境地区吐

藩、回鹘上层统治集团也骚乱不断，唐王朝内忧外患，其败势如江河决堤、一溃千里。杜牧正生活在这样一段多事之秋。

面对衰败国势，李义山唱出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挽歌，而杜牧却不像李商隐那么悲观，他身体力行，攻读兵书，潜研“治乱兴亡之迹，财政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总结历史和现实的教训，得出了安邦必先削藩，削藩必须“知兵”、“重兵”的结论。此外，文宗、武宗、宣宗三朝皇帝，力图削藩兴国的作为，也刺激了杜牧挽救唐王朝危运的幻想，但同无数古代文人一样，他将拯国救民的理想寄托在帝王身上。而唐王朝此时已是积重难返，千疮百孔。武宗和宣宗两朝的小康只是行将灭亡前夕的回光返照，杜牧正是怀着济世救国的丹心灵药，奔波在无法挽狂澜于既倒的悲剧中。从他诗文及历史记载中，可以大致将其经历分成以下四段：

1. 初期(803年出生至835年)。这段时间包括828年他进士及第与以后的幕府生涯。名门官僚家庭刺激了杜牧的功名欲望，但同时少年不幸，也使他较早地了解到下层生活的艰辛，产生了忧国忧民的思想，同时人单势孤，世态的炎凉砥砺着他耿介的个性，使他对随波逐流，苟合取容有着切齿痛恨，所以史书称他“刚直有奇节”。进士及第前，他因忧虑敬宗皇帝大兴土木，挥笔写下

了脍炙人口的《阿房宫赋》，以艺术的形式，通过对阿房宫的兴建和宫中奢侈淫靡生活的描叙，揭示了秦朝灭亡的原因，从而借古讽今，告诫晚唐最高统治者，以免重蹈秦亡的覆辙。杜牧未入仕前的作品，充满少年的豪迈气概，有强烈明确的针对性。主题大致集中在两个方面：以古鉴今，指明豪奢败国是一条必然规律；希望早日削平藩镇，收复失地，结束分裂。入仕以后，随着思想的成熟，较多的是通过咏叹自己的坎坷遭遇，曲折地反映封建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险恶，或者抒发壮志难酬的感慨。

杜牧制策登科后，被授予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任职不到半年，就应江西观察使沈传师之辟为江西团练巡官，试大理评事，赴洪州充任幕僚。830年，沈传师迁宣歙观察使，杜牧也随同前往宣州。后又应牛僧孺之辟到扬州做了淮南节度推官，监察御史里行。在这段时间里，他不仅和沈传师及其弟沈述师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受沈述师之托为李贺集作序，从各个方面评价了李贺诗的得失，而且在扬州期间，把酝酿已久的“系虏”之策加以整理，写成了《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等军事论文，鞭辟入里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系统而完整地阐发了削藩安邦的战略和策略，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而且在对待党争问题上，他从不无原则地支持、迁就、倾向某党，也不因某

党一时得势而趋附一方，表现了他的正义感。总体来说这一时期，他心中充满了渴望为国建功立业的满腔热忱，并做了很多切实的准备和努力。

2. 早期 (835 年至 842 年)。这一期间，他先由扬州被召回长安，任监察御史，结束了七年的幕僚生活。就在他即将动身去长安时，朝廷内正酝酿着朝臣与宦官的恶斗，杜牧预感到凶多吉少，于是借病辞退，当年便以监察御史分司东都。果然他离京仅几个月，就暴发了“甘露之变”，这是皇权、朝官与宦官之间矛盾尖锐化的集中表现，因为杜牧一向厌憎专横疾贤、阿谀逢迎的李训、郑注，所以他在《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及《李甘诗》等诗中，历数李训、郑注的罪恶，而对甘露之变后宦官造成的政治恐怖只字不提，这在认识上是有偏颇的，但“甘露之变”却使他的思想和情绪都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发生了遽变。原先那种报国的豪气开始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对国势日蹙的悲哀，以及超脱是非名利的悠闲之情。这在《洛阳长句两首》及《洛中送冀处士东游》中都可见出，《东都送郑处海校书归上都》中甚至流露出隐忍退縮的思想，一个心高傲岸，不甘庸碌之人，渴望在仕途上一试身手的有志之士，却落到这等地步，心情是可想而知的。837 年，杜牧因弟弟眼疾失明，告假东下扬州治病，后又应召到宣州做团练判官。

在宣州期间，杜牧放情山水，故作旷达，在叙述登临、赏景、纵酒、题咏之乐后往往有一种世事沧桑、人生难驻的伤感袭上心头，平添了淡淡的悲凉。这段时期是他归隐与入世的矛盾期。所以在838年迁左补阙、史馆修撰时，他并没有立即启程赴长安。第二年春，他乘船经长江、汉水、襄阳、南阳、武关、商山，一路上观赏风景，采访古迹，赋诗抒怀，极力排遣愁闷难奈的心境。严酷的现实和坎坷的生活，磨掉了杜牧早年那种刚直的锐气，使他变得谨小慎微，踟躇不前。此时长安亦是宦官专权，到处笼罩着恐怖气氛。841年李德裕为相。842年，杜牧被外放为黄州刺史。

在这段时期，杜牧厌恶了浊气蒸腾的官场，体验到了自然界山山水水的秀美和乡村民风的和谐淳朴，而他却多年辗转，事业无成，不能不怅惘若失，何况他又心怀苍生，不能忘怀于拯国救民。这种痛苦与矛盾即使寄情山水也只能是举杯消愁。所以外放黄州，能够亲理民政，也使他的才能得以施展。

3. 中期(842年至849年)。这七年中，杜牧先后任黄州刺史、池州刺史及睦州刺史，并在848年，被调京出任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在黄州及池州任上，杜牧察访调查，革除了地方上的许多弊政，为整顿治理地方作出了努力，对振兴唐王朝仍抱着美丽的幻想。如843年，李德裕发兵讨伐泽潞、抗击回

纥，杜牧竟兴奋得未等捷报就唱起了凯歌；又积极上书，陈述用兵之策。《郡斋独酌》诗中言“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844年，朝廷以回鹘衰微，吐蕃内乱，议复河湟四镇十八州，杜牧非常振奋，立刻写信托京中友人为他请命出关，杀敌报国，还作诗赞扬武宗的英明果断，虽不无谀美之辞，但他渴望早日收复河湟，拯救百姓的心情，却是值得肯定的。

可是，杜牧的种种努力和热情换来的只是当权者的冷遇，他只能用《自遣》、《自贻》等诗歌来加以抒发。这时老庄清静无为，超然物外的思想在他诗中占了很大比重，他开始齐死生、一是非、等贵贱，对人生充满消极的感叹：“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这在他和李方玄、孟迟、张祐等人的赠答、唱和诗中也有显现。尤其迁睦州后，他作品中多了抒发外放悲苦和浓烈乡思的成分。这是他经历困蹶后对自身老大蹉跎的悲感。怀利器而沉沦，汲汲济世而遭弃，这是杜牧一生的创伤。所以在大中二年被调京任司勋员外郎时，他“神魂飞扬”、“喜过成泣”，告诫自己，为官须乖巧，以免重蹈覆辙，自讨苦吃。此时的杜牧，已是谨小慎微的君子。这一方面是封建制度压抑、摧残人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表现出诗人的软弱和萎靡。而杜牧之所以庆贺升迁，不愿失去这次良机，仍是感叹国势日衰，对危机四伏、四分五裂的唐

王朝命运投注了深切的关注和忧虑。

大中三年，吐蕃内乱，河湟地区人民起义，唐朝趁机收复了原州、秦州等地，杜牧以极夸张的手笔歌颂了宣宗的功勋，还把多年心血撰成的《孙子注》献给朝廷，但此举并没有受到重视，杜牧对唐王朝腐败不堪收拾的局面终于死心。849年自动请求外放为杭州刺史，未被允可，后又三次上书，终被允外放为湖州刺史。

4. 晚期(850年至852年)。两年前，杜牧还对调回京师“感激彷徨”，而此刻却因统治阶级粉饰太平、生活腐化而失去了信心。在湖州，他感到去日无多，回天乏力，又年老体衰，因而变得特别豁达，甚至颓废。视功名如草芥，惋惜不能像当年那样纵酒不拘、及时行乐。杜牧晚年人生观中这些消极的因素，集中反映了大部分封建士大夫在积极进取精神受挫后的精神面貌，更有洞悉世事黑暗后的无能为力。851年，杜牧迁考功郎中，第二年又迁中书舍人，但这些已引不起杜牧兴趣。他考虑的是怎样度过一个清闲的晚年，他重新修葺了樊川别墅，并经常邀请亲朋好友来此游赏。

步入晚年，随着对朝政腐败及人生过程认识的加深，他终于看破红尘。“庄叟彭殇同在梦，陶潜身世两相遗”，完全消沉了，唯有沉溺流连于棋局杯酒才乐不可言。接连多年劳累及各种打击严重损害了杜牧的健康。

852年，他自度将不久人世，写了《自撰墓志铭》，冬卒于长安安仁里旧第。

杜牧的一生，是有才华的文人士大夫积极报国，以个人的生命和黑暗现实、苍桑社会抗争奋斗的一生。

二

杜牧晚年染病后，对一生所著诗文加以检阅，毅然焚毁了大部分自己不满意的书稿，只留下十之二、三。他去世后，外甥裴延翰将平素收藏的杜牧诗文四百五十首编为一集，共二十卷，取名《樊川文集》。宋代，有人编次《樊川外集》与《别集》。清人冯集梧承继家业，为杜牧《樊川诗》作注，用力甚勤。

杜牧今存的诗歌，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重大事件，评述到各方面的重要问题。毫不夸张地说，杜牧是记录晚唐社会的小“诗史”。下面分两个方面来介绍杜牧诗歌的特点与成就。

一、内容上：李商隐有诗云：“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李商隐作为一个真正的知音，强调杜牧的诗是“刻意”之作，是有感于“高楼风雨”的时局和“短翼差池”的身世遭遇而发的，充分肯定了他多数“伤春”、“伤别”的诗有深刻的社会内容，而非单纯表现

个人失意的伤感和征歌狎妓的颓废。实际上，杜牧刻意去“伤”的，几乎遍及晚唐社会的方方面面：

1. 关注藩镇割据叛乱，表达收复失地，拯救边民的决心。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长期延续，影响到唐王朝政治、财政、边防、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杜牧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密切关注这一问题。826年沧州用兵时所写的《感怀诗》，堪称一部藩镇叛乱的罪恶史，对战乱给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滔天罪行进行了声讨，还深刻指出，自“安史之乱”到沧州用兵整整七十年中，朝廷无力削平藩镇，是因为国库空虚，军需匮乏，缺少精兵强将，官吏队伍不纯，战略战术错误，因而常有征讨之名，却无力量兴师问罪，助长了藩镇气焰，确是不乏真知灼见。此外如《东兵长句十韵》、《史将军二首》、《郡斋独酌》等诗中，诗人或歌颂削藩有功的宰辅将领，或表达对叛乱者的蔑视和对胜利的信心，抒发了迫切希望平乱的心情。

另外，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转衰，也使西北异族统治阶级有可乘之机，边患迭生。杜牧不少诗歌真实地反映了这方面的史实。如《皇风》、《闻庆州赵纵使君与党项战中箭身死长句》、《边上闻笳》等，或对平叛、收复失地欢欣鼓舞，或热情歌颂为国捐躯的将领，或对视牺牲为“轻生”的达官贵人表示鞭